

“披头士”与《老子》47章

■ 高峰枫



▲ 披头士乐队吉他手乔治·哈里森

▶ 收录“The Inner Light”的披头士乐队单曲唱片

一位在剑桥教梵文的西班牙学者，把自己编辑的《世界神秘主义精萃》寄给狂热迷恋印度宗教的利物浦小伙子，还给他划了重点。24岁的英国小伙子欣然接受专家的建议，将老子的一段箴言谱写进印度旋律中。就这样，《道德经》被“披头士”一首附歌带入西方流行音乐，而灵感和推动力来自西班牙的梵学家。



“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在1968年3月15日推出一张单曲“Lady Madonna”，很快就占据英国排行榜榜首。当年发行的流行音乐单曲唱片，正面灌录的是主打歌，为了冲击排行榜，称为A-side。而背面则放上一首不太重要的作品，称为B-side，如同一个附录、一件福利。“Lady Madonna”的“附歌”叫做《内观》(“The Inner Light”)，乃是“披头士”中那位英俊而安静的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1943—2001)创作、演唱的。歌词出自《老子》47章，这是“披头士”资深粉丝都知道的事，不算非常冷僻的知识。我们先复习一下英文歌词和《老子》原文。英文非常简单，不含托福词汇。

Without going out of my door
不出户
I can know all things on earth;
知天下
Without looking out of my window
不窥牖
I could know the ways of heaven.
见天道
The farther one travels 其出弥远
The less one knows 其知弥少
The less one really knows 其知弥少
(歌词重复一遍，第二段中my改成your, I改成you)
Arrive without travelling 不行而至
See all without looking 不见而明
Do all without doing 不为而成

《内观》因为是附赠的歌曲，不曾收入乐队发行的专辑，也从未在“披头士”演唱会上表演过，所以知名度很低。“披头士”所有单曲在1988年被收进Past Masters这张双CD合辑中，里面甚至包括他们早年用德语演唱的两首歌。我第一次听到《内观》，就是在这张合辑中。乔治·哈里森是主唱，伴奏全部使用印度乐器(西塔琴、塔布拉手鼓等)，而且都是由印度音乐家演奏(详见后文哈里森的自述)。“披头士”四只甲壳虫中，哈里森

是最“东方”的一位，乐队专辑中那些带有鲜明印度特征的歌曲，全是他的手笔。1965年，哈里森追随印度音乐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 1920—2012)苦练西塔琴，这一年年底发行的《橡胶灵魂》(Rubber Soul)专辑中，《挪威森林》一首歌里开始飘出西塔琴飘渺的声音。这是乐队首次使用西塔琴，正是初学乍练的哈里森弹奏的。1967年哈里森和其他成员开启了印度之行，练习瑜伽和冥想。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最有名的歌曲，叫作《身内身外》(“Within You Without You”)，也是充满玄妙的印度味道，收录于1967年著名专辑《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哈里森为何选用《道德经》作为《内观》这首歌的歌词？具体说，痴迷于印度宗教和印度音乐的英国摇滚歌手，在创作一首弥漫着恒河气息的歌曲中，为何想到用中国先秦哲学的文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考察这首歌的创作过程。

乔治·哈里森在1980年出版自传I Me Mine，标题取自“披头士”解散之后创作的一首歌，中文实在无法翻译。这首歌大致表述了印度教的基本思想，即外部世界空幻不真，个体之小我也不是真我。这部自传的叙述文字只有70多页，后面是很多珍贵照片以及歌词创作的手稿(我依据2002年重印的版本，另有2017年出版的增补版)。第118页，哈里森讲述了创作《内观》这首歌的缘由。文字不算长，我想，与其撮述，不如抄录。下面是我的翻译。

片送给我。我很高兴，很感人的歌，希望能感动亿万灵魂。你刚刚开启这场重要的旅程，后面会写出更多歌。”

他还送我一本书，标题是《火之灯》。他在信里说：“把讲‘道’的几句话写进你的音乐，或许是件有趣的事，比如本书第66页上的第48段。”这就是《内观》歌词的来历，是《道德经》的一段译文。我把他的信以及这一页书的书影都附上。

这首歌用的全部是印度乐器，全部由印度音乐家演奏，在孟买的H.M.V录音室灌录。我感觉大部分人不太注意这首歌，因为当时的西方流行音乐而言，我做有点儿“太过了”。

原诗本来是这样的：“不出我户，我知天下……”(Without going out of my door... I can know the ways of heaven)为了避免误解，也为了把歌拉长一点儿，我就把歌词重复了一遍，在第二段里，把“我”都改成“你”。这样就使所有人都包括进来。

这首歌是特意写给胡安·马斯卡罗而写，因为他送给我这本书，他是个可亲的老人。歌儿很不错，歌词说明了一切。阿门。(George Harrison, I Me Mine, Weidenfeld & Nicholson, 2002, p.118)

看到胡安·马斯卡罗(Juan Mascaro, 1897—1987, 有时写作Mascaró)这个名字，我不得不由一写。因为他是1962年企鹅版《薄伽梵歌》的英译者。这个译本发行量很大，我买到过2003年的重印。企鹅版刊登的译者简介，曾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马斯卡罗是西班牙人，后来在剑桥学习梵文、巴利文、英文这些古代和现代语言。毕业后，他曾在牛津讲授西班牙神秘主义，又在锡兰(斯里兰卡)、巴塞罗那等地的大学执教。西班牙内战之后，他最终选择定居英国，从事古代印度典籍的翻译，也在剑桥承担一些教学工作。他为“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翻译过《奥义书》《薄伽梵歌》《法句经》等书。一位西班牙学者，终身致力于梵文、巴利文经典译成并非自己母语的英文，这是马斯卡罗有别于其他欧洲东方学家的地方。

马斯卡罗本是梵学家，为何要向哈里森推荐《老子》？这个问题通过阅读《火之灯》，可以得到部分解答。《火之灯》(Lamps of Fire)一书是马斯卡罗选编的世界各大宗教精粹。1958年先出了一部限量版，只印了200册。1961年英国Methuen出版社出了新版，也就是马斯卡罗送哈里森的这一版。作者先有一番总论，按照时代顺序，从印度教、波斯拜火教、佛教、耆那教、道教、儒家、神道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各教中摘出提纲挈领的语句，相当于各教总纲。在总论部分，道教部分选了《老子》中的三章：25章(“有无混成、先天地生”)、49章(“圣人无常心”)和67章(“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在总论之后，马斯卡罗就按照“光”“爱”“生”三个主题，辑出各教名言警句，混排在一起，共计300段。

将《火之灯》翻阅一遍，会发现这本世界宗教思想精粹的“老子含量”极高。全书共收300段选文，每段选文长短不一。但统计各家经典的引用次数(不算选文的篇幅)，则《老子》一骑绝尘，遥遥领先。全书引用《老子》共计46段(即《道德经》完整的46章)，占300段总数的15%。《老子》八十一章中，竟有超过一半被马斯卡罗选中，复制在选集中。如此高的人选率，非常惊人，因为《火之灯》中，《旧约》《新约》和柏拉图加起来也不过48段，在段数上与《道德经》堪堪持平。而马斯卡罗专辑的印度教经典，《吠陀》《薄伽梵歌》《奥义书》三者相加，也只有26段。

《老子》47章出现在《火之灯》第66页，全书编号为第48段，并有“Rendered by J. Mascaro”的标注。如果不细心的话，读者会以为这一章是马斯卡罗自己翻译的，因为render一字确有翻译之义。很多网上资料称，乔

治·哈里森将马斯卡罗的译文略加改动，就形成《内观》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不然。我发现马斯卡罗在标记译文来源时，自有一种独特的书法。

马斯卡罗首次引用《道德经》之后有一句标注，用语颇有些含混：“由马斯卡罗从多种译本改译”(Rendered from many versions by J. Mascaro, p.28)。对比他其他各处的标注，会看到用语的差别。凡是梵文、巴利文经典，他都直书“马斯卡罗译”(Translated by Mascaro)。凡是他不会、或不擅长的古代语言(如古波斯语、阿拉伯语等)，他都直接注明译者。中文典籍方面，《论语》他使用赖发洛(L. A. Lyall)的译本，《中庸》用的是辜鸿铭的译本。但唯独首次引用《老子》时，他使用“从多种译本改译”的写法。考察马斯卡罗的学术背景，似乎没有专门学习过古汉语。因此，我猜测他是对比多种英译本，左右采撷，最终得出一个符合自己理解的译文，而不是从《老子》原文直译。也就是说，他注明译本来源的体例是，凡用translate之处，都代表他对现有英译本进行了综合和改编。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误以为哈里森创作的歌曲是马斯卡罗自己的译文，其实不然。他给哈里森指定的这段《老子》，其实是一个“和合本”的翻译。

《火之灯》一书中，《道德经》超高的引用率说明马斯卡罗个人对老子思想有浓厚兴趣。此外，印度学者对《老子》的反应，或许也能从侧面说明一点问题。在《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集》1924年的中国之行后，有人借给泰戈尔《道德经》的英译本。泰戈尔读后，兴奋异常，对朋友说：“可是，这思想完全完全是印度思想，我反反复复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奥义书》。”(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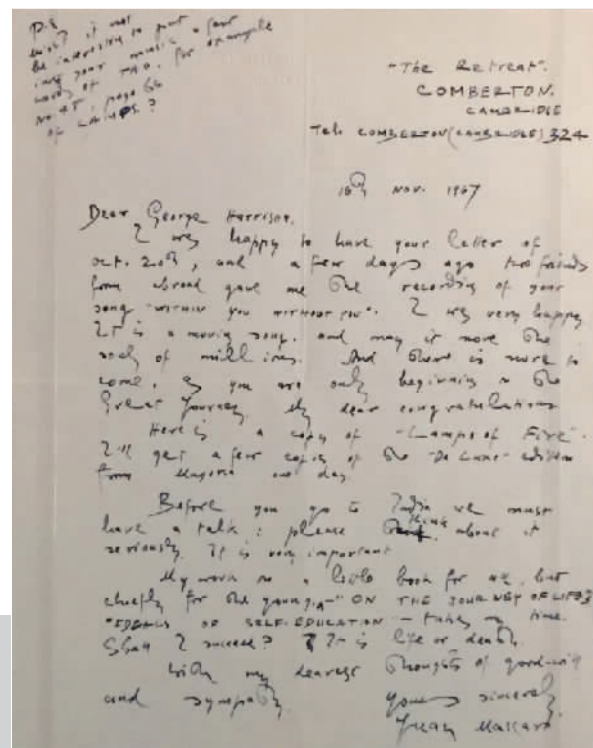
自 Rabindranath Tagore: A Centenary Volume, 1965, p.21)马斯卡罗有可能与泰戈尔一样，在《老子》一书中读出了天竺思想。

理清《内观》一首歌的创作过程，澄清理清歌词的来源，特别是得知为哈里森指定了歌词的马斯卡罗的学术背景，整个事件就越来越像一篇博尔赫斯的小说。一位在剑桥教梵文的西班牙学者，把自己编辑的《世界神秘主义精萃》寄给狂热迷恋印度宗教的利物浦小伙子，还给他划了重点。24岁的英国小伙子欣然接受专家的建议，将老子的一段箴言谱写进印度旋律中。就这样，《道德经》被“披头士”一首附歌(B-side)带入西方流行音乐，而灵感和推动力来自西班牙的梵学家。这算是中、印、西、英之间一次稀里糊涂、“不约而同”的文化合作。

2002年11月29日，为纪念哈里森去世一周年，著名乐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召集了哈里森生前好友，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演唱会，叫做Concert for George。摇滚乐坛一批嘎嘣唱将轮番登台(包括前“披头士”的保罗和林戈)，共同演唱哈里森创作的歌曲，气氛热烈而感人。《内观》被归入演唱会前半场的“印度”部分，由香卡的女儿阿努什卡(Anoushka Shankar)演奏西塔琴，哈里森的儿子演奏钢琴。在两位“星二代”身边，父辈的Jeff Lynne代替哈里森为新千年的英国听众演唱“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回荡着西塔琴奇幻飘渺的梵音和《老子》古老深邃的谣谚体歌词，可能会让一些人“老子化胡”再次生出微茫的希望。(《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集》中的材料，由友人周提供，在此表示感谢)(作者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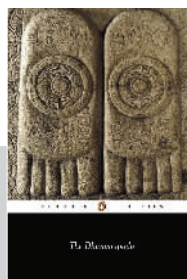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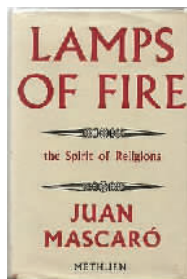


▲ 西班牙梵文学者胡安·马斯卡罗(1897—1987)



▲ 1967年，马斯卡罗写给哈里森的信

▼ 马斯卡罗选编的《火之灯》



▲ 马斯卡罗译《法句经》

文匯学人
第553期

寄情沙漠的江南水乡之子

■ 邹怡

近日，鄱阳湖沿湖多地再现旱情，昔日“长波万顷阔，大舸一帆轻”的鄱阳湖大面积萎缩。位于我国东南暖湿地带的鄱阳湖周边，为何会出现宛若西北寒旱地区的沙漠景观？其实，这一现象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为地理学家朱震达所关注。

1986年，朱震达发表论文《湿润及半湿润地带的土地风沙化问题》，揭示了非寒旱地区的土地沙化现象，其中就包括赣江下游鄱阳湖周边的沙地和沙丘。他分析发现，湿润及半湿润地带虽然拥有相对丰富的年降水量，然若地表由沙物质组成，植被遭破坏而沙体裸露，且于季与季风同步，在风力作用下就会产生风沙活动，形成沙丘起伏的沙漠景观。

当时，于早及半干旱地区的沙漠早已为学界和社会所关注，但湿润及半湿润地区的土地沙化，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难入一般沙漠专家法眼，而朱震达敏锐地意识到此类地区沙化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湿润及半湿润地区的土地沙化虽然范围小、分布散，但多位于人口密集

的经济发达地区，对人类生产生活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朱震达先生是中国沙漠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史地系和南京大学地理系，后被中国科学院选派至苏联留学深造，专攻沙漠研究。1958年，朱震达学成回国，先后参与、组织了对塔克拉玛干等中国北方寒旱区沙漠的系统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先后于1974年和1979年编绘出版了1:200万《中国沙漠分布图》和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沙漠图》。他于1974年完成的我国沙漠研究首部通论《中国沙漠概论》，迭经修订重印，已成中国沙漠研究之经典。1978年，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即今日中国科学院寒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前身，随后又创办《世界沙漠研究》《中国沙漠》和《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集刊》等学术刊物。因其学科开创之功，朱震达先生被誉为“中国沙漠研究之父”。

朱震达倾心于沙漠研究，有着自觉的现实服务意识。上世纪50

年代，他关注北方寒旱区沙漠，与当时包兰铁路初建，亟需解决沿线沙漠控制和风沙防护问题密切相关。很长一段时间内，沙漠研究的重点是现有沙漠的控制和治理，但自70年代后半期，结合世界沙漠研究趋势与国内生态现实，朱震达指出，中国及全球面临的沙漠问题已不止现有沙漠的治理，还包括生态脆弱地带向沙漠的转变。未来，我国沙漠研究的重点应当从沙漠转向沙漠化，即以沙漠化问题为中心，深入探究沙漠化的成因和过程，并做出预测。

80年代上半期，朱震达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沙漠化的专题研究，研究区域也从传统的干旱区沙漠荒漠转向半干旱区农牧交错带及早作地区的现代沙化土地。80年代后半期，朱震达的研究重点又从沙漠化过程转向沙漠化防治，积累总结适合不同气候带沙漠化防治的路径和措施。“沙漠”与“沙漠化”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大不一样。朱震达强调，沙漠化土地不是沙漠和戈壁，而是曾有生产力的土地因为人类不合理

的活动而呈现为类似荒漠或沙漠景观的退化土地，也就是说，沙漠化土地是曾经具有生产力的土地。朱震达如此强调，是因为当前具有生产力的土地有可能因为人类活动而重蹈覆辙，趋于退化，而已经退化的土地，经过一定措施，仍有恢复生产力的可能。朱震达测算中国沙漠化土地的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该面积遭到不少质疑，反对者认为沙漠化土地与沙漠应当区分，如此则有百余万平方公里。不同算法会影响国家环境治理资金的流向与分配，朱震达从科学出发，尊重自然规律，不夸张、不虚报，力主有限的生态建设资金优先向具备恢复可能的沙漠化土地。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朱震达的关注点从沙漠化防治扩展至土地荒漠化治理，湿润及半湿润地带的沙化土地由此进入他的研究视野。朱震达研究了这类沙地的成因和特征，称此现象为“土地风沙化”。

风沙化问题甚至出现于温暖湿润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江西南昌新建厚田，因赣江河道下切，两岸相继抬升，赣江冲积物经过季风的吹蚀、搬运，裸露堆积，形成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周边极为罕见的沙漠景观。为此，江西地方领导邀请兰州沙漠研究所参与赣江下游流动沙地的治理。1988年初，朱震达的团队

在南昌厚田建设沙漠试验站和治理示范区，将西北沙漠、华北风沙的治理经验运用于赣江下游沙地，种植绿化面积近27公顷，人工绿化带与沙漠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有效遏制了沙地的移动扩展。

朱震达介入这项工作，有其学理上的考虑。兰州沙漠研究所参与第三世界国家沙漠治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办国际培训班，广泛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沙漠，其景观样态和整治模式均有差别。中国已有的理论与经验主要得自西北温带沙漠，并不能机械地套用于其他类型的沙漠，因此，中国的沙漠研究还需要更多亚热带土地沙漠化的规律探索和实践。赣江下游沙地、红壤地区的沙漠化土地以及海滨沙地，虽非典型沙漠，但从学科发展角度言之，正是需要探索的空白领域。更何况，湿润及半湿润地带的土地沙化更接近人口、产业稠密地区，其发生机制更为复杂多元，影响路径更为微妙深广，与现实问题的关联亦更为紧密。

鄱阳湖周边的风沙化土地具有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地区沙化特征，朱震达团队在厚田的治沙实践不仅可运用于我国南方的风沙化土地，还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及中国科学院“国际沙漠化研究与培训中心”的现场教学案例，被推广至世界其他同类湿润地带的风沙化治理。

上世纪90年代初，朱震达退休，但他依然关心着沙漠治理和荒漠化防治。他对南方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研究，大多完成于退休之后。朱震达心系的不仅是寒旱区的沙漠和沙漠化，更是各地的土地退化问题；他所寄情的不是个人的颐养天年，而是子孙后代安居乐业，共享美丽中国。

1999年6月的一天，北京酷热难当，朱震达忽接水利部电话，希望能向他咨询关于沙漠化定义的问题。先生非常兴奋，坚决谢绝对方上门，执意亲自前往指导解释。当晚因劳累过度，朱震达突发脑溢血入院。中青年时期艰苦的野外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病根，此后七年，他辗转多家医院。2006年9月30日凌晨4时20分，饱受沉疴的朱震达先生离开人世，享年76岁。

朱震达一生寄情沙漠，却是地道的水乡之子。1930年6月20日，他出生于浙江海宁的江南鱼米之中。投身地理科学后，因缘际会，以干旱草莽、飞沙扬砾的沙漠为一生事业所依，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的沙漠科学研究。在他科学生涯的后半程，不惧讥讽，将关注点转向人口稠密的湿润及半湿润地带。他对湿润及半湿润地带土地退化的敏感与关切，或许也与他出身江南有关吧。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